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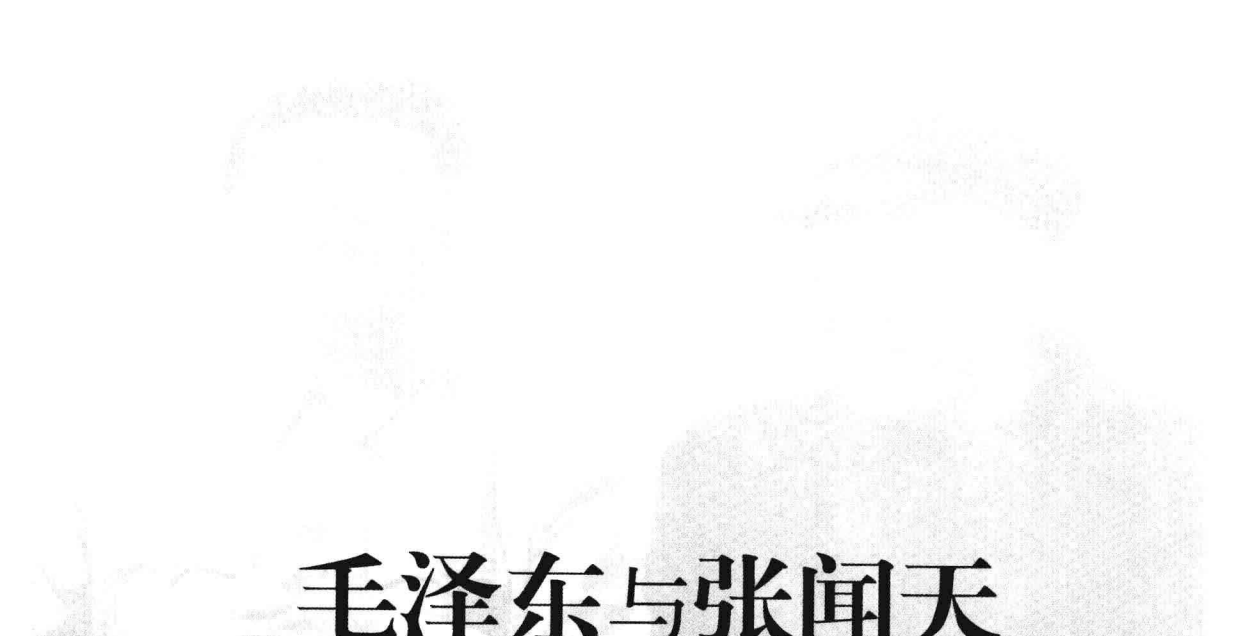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与张闻天 跟着真理走

张树德◎著

毛泽东曾诙谐地称张闻天为“开明君主”。
张闻天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中国青年出版社



毛泽东与张闻天 跟着真理走

张树德◎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跟着真理走:毛泽东与张闻天/张树德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5153-1165-4

I. ①跟… II. ①张… III. ①毛泽东(1893~1976)——生平事迹

②张闻天(1900~1976)——生平事迹 IV. ①A752 ②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9252号

责任编辑:李文华

封面设计:周周工作室

出版发行: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 编:100708

网 址:www.cyp.com.cn

营销中心:(010)57350370

编辑电话:(010)57350520

印 刷: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经 销:新华书店

规 格:700×1000 1/16

印 张:18

插 页:2

字 数:260千字

版 次:2012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12年12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定 价:36.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010)57350337

目录

CONTENTS

001 — 第一章

山沟里走出的“土包子”马克思主义者与留过洋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和张闻天从不同的起点和方向走上了相同的革命道路。

017 — 第二章

在毛泽东受到排挤之时，张闻天从苏联回国，被共产国际迅速推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进入中央苏区后，张闻天在实际工作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上同博古产生分歧，同毛泽东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

035 — 第三章

李德、博古凭着看地图躲在房间里指挥战斗，致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重大挫折。福建事变的发展让张闻天进一步看到了“左”倾幼稚病的危害，在思想认识上真正与毛泽东站到了一起。

043 — 第四章

广昌战役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张闻天和博古、李德的分手。毛泽东向中央提出的正确建议多次被李德、博古等拒绝，红军只剩下长征一条路。

055 — 第五章

担架上的“密谋”——长征途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组成了反对“最高三人团”的“中央队三人团”，力挽狂澜。

063 — 第六章

毛泽东说：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

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073 — 第七章

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倾注全部精力和才智纠正“左”倾军事路线错误，不仅保证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而且在实际上确保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081 — 第八章

四渡赤水引发了“走路”和“打仗”的争论。林彪私自写给中央军委的一封信，引发了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误解。张闻天被怀疑和彭德怀一起反对毛泽东。

095 — 第九章

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张闻天从大局出发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提出给张国焘让出“总书记”一职；毛泽东说：不可。

119 — 第十章

从张闻天的读报笔记到榜罗镇会议、吴起镇会议，毛泽东和张闻天为红军和中国革命最终找到落脚点，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135 — 第十一章

西安事变中，就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张闻天最先提出了“尽可能争取南京政府正统”的正确主张。毛泽东极富预见性地作出内战已然结束、全国抗战就此开始的判断。

153 — 第十二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积极配合毛泽东，消除分歧、统一思想，提出、确立和贯彻了“独立自主地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

173 — 第十三章

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主动“让位”，推举毛泽东为党中央总书记。毛泽东对王震说：“洛甫（张闻天）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

187 — 第十四章

延安整风期间，张闻天写就了近四万字的自传，称《反省笔记》。毛泽东看了之后到张闻天的窑洞里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

201 — 第十五章

张闻天提出的东北工作方针与毛泽东提出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东北战略方针不谋而合。对于分红问题，毛泽东说：“少奇同志，我不支持你的意见，我是支持洛甫的。”

221 — 第十六章

庐山会议上，张闻天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精神“犯颜直谏”，成为“反党集团”的“副帅”、“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毛泽东说他“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

257 — 第十七章

几年赋闲，张闻天潜心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哲学问题。他不同意毛泽东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笔记中记录了他与毛泽东的分歧点。

265 — 第十八章

“文化大革命”中，张闻天受到不公正对待，仍坚持学习毛泽东思想、研究社会主义现实问题。他写信给毛泽东请求回北京，毛泽东读后让身边人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

273 — 第十九章

沉重的1976年，两位伟人相继去世……

279 — 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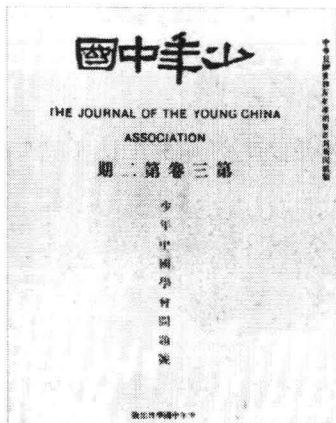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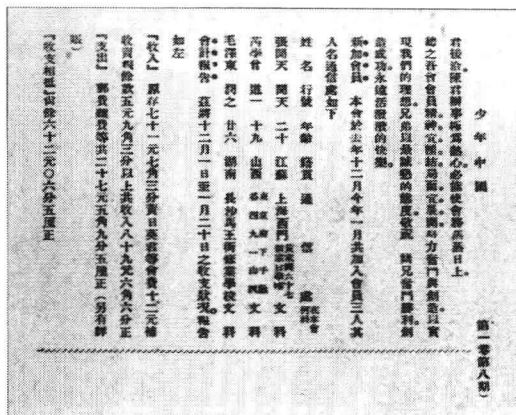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山沟里走出的“土包子”马克思主义者与留过洋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和张闻天从不同的起点和方向走上了相同的革命道路。

在中共的历史中，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是比较特殊的。张闻天曾是毛泽东的上级，后来毛泽东成了张闻天的上级。他们之间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可以透视出中共发展史，乃至中国革命中许多事件的正确与错误、曲折与顺利、高潮与低潮。

张闻天与毛泽东关系的开始并不像中共其他一些高级领导人那样长、那么早。虽然早在1920年初，张闻天就知道毛泽东的名字了，但他们真正的相识、相知却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才开始的。

1919年12月张闻天加入刚刚成立不久的青年进步组织“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1月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组织。1920年2月出版的《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刊登了两人入会的消息。以后毛泽东、张闻天的行踪，在《少年中国》上时有披露。由于会友的这一层关系，两人早已相互知道了。只是因为毛泽东对“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并不怎么热心，张闻天又时去国外，所以在整个20年代两人无缘一面。



■《少年中国》刊登的张闻天、钱学曾、毛泽东三人入会的消息。

毛泽东的出生地——韶山，在湖南省湘潭市西，位于湘潭西部，与宁乡、湘乡交界。相传虞舜南巡经此，演奏韶乐，因而得名。

据清乾隆二年（1793年）《韶山记》记载：韶山为“楚南一名山”，它“祖西华，面南岳，介三湘而远七泽，发岳麓而控东台”。又据清光绪七年（1881年）韶山毛氏二修族谱《韶山八景序》记载：“韶山拔起一峰、高出云霄、为诸山之祖”，即韶峰。韶山为南岳七十二峰之第七十一峰，古人曾赋诗赞美：“绕岫岚光凝欲滴，长风轻袅云烟侧。山涵五月六月寒，地拥千山万山碧。从来仙境称韶峰，笔削三山插天空。天下名山三百六，此是湘南第一龙。”韶山不仅山为奇山，而且这里也出奇人，而最伟人的，当数毛泽东。

毛泽东 1893 年 12 月 26 日出生在韶山冲南岸上屋场，字咏芝，后改为润之。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一生贫苦，勤劳厚道。父毛貽昌（字顺生），原为贫农，曾因负债被迫当兵多年。由于他治家严谨，经营有道，使家由贫农发展成富农。母亲文氏（文七妹），和善好施，乐于助人。毛泽东有胞弟毛泽民、毛泽覃，另有继妹毛泽建。

韶山是一个封闭的小山村，城市里发生的事情很难影响到这里，而这里发生的事情也很少为外面的人所知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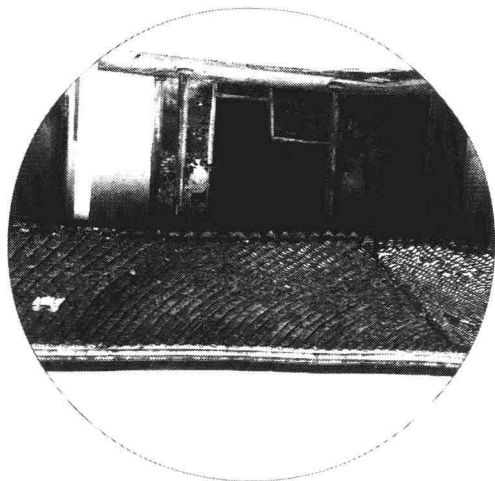
张闻天的出生地却与韶山不同。1900 年 8 月 30 日，张闻天出生在上海川沙与南汇两县交界的一个叫张家宅的村子（今属浦东新区祝桥



上海浦东张家宅张闻天故居。

镇)。张家宅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从南面的祝家桥坐轮船西行六十多里，就是当代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上海所发生的一切，这里很快就能知道。

在这里，张闻天受着江南水乡清新秀丽而又繁富多变的自然景观的陶冶。正是这交通便利、信息传递快捷又田园式的生活，形成了张闻天理论家、学者、艺术家的特质，还带有那个时代有志青年所特有的反叛精神。



张闻天 1900 年就诞生在这里。

张闻天从小聪明好学，从六岁时就进入私塾，读“四书”、“五经”，然而与当时的孩童所不同的是，张闻天年少时就开始接受“新知”和西

方现代文化。张闻天 11 岁时便进入南汇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寄宿读书，从这时起就开始学习算术、理科、英语、历史、地理了。当时的“南汇一高”是一所新式学堂，全部采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最新出版的课本，学校里不乏新派人物。

1915 年夏，张闻天从“南汇一高”毕业，后就读于南京全国水利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当年 8 月，考入吴淞水产学校。

可以说，张闻天从小就接受了西方文化、西方文明和近代科学的影响和启蒙。

与张闻天所受到的教育有所不同，同年龄时的毛泽东更多的是接受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少年毛泽东不仅喜欢读经书，更喜欢读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喜欢读反映反抗统治阶级压迫和斗争的故事。他曾读过《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等，对于其中许多故事都能“背得下来”。这些书对于后来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起了巨大的作用。就《水浒传》而言，其中就有不少例子被毛泽东在后来所写的文章中所引用。例如：《水浒传》中林冲打败洪教头的故事，他就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引用，借以论述“战略退却”的思想。在《矛盾论》中，他在论述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时候，也引用了《水浒传》中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当然，《水浒传》中的故事，对于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而言，其影响主要还是在思想方面，如“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等。另外像《左传》，毛泽东对于其中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军旅大事的描写，也特别关注。在其著名的军事论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曾引述了《左传》中的曹刿论战的故事，来论证“敌疲我打”这一战略原则。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也曾以晋楚城濮之战，来论述主观指导对于战争的影响，又以宋襄公不肯半渡而击、结果被楚军打败的事例，阐述了出其不意、战而胜之的思想。据有关资料统计，在《毛泽东选集》（共 4 卷）中，毛泽东所引述的成语典故和史实，属于《左传》的就有约 40 条，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左传》一书在当时所读之精。

1910 年秋天，毛泽东由表兄文运昌带路，挑着行李和书籍来到湘

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走出封闭的韶山冲，此时毛泽东正好 17 岁。1911 年春天，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长沙省城读“新学”。

正像同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这时的毛泽东与张闻天都面临着一个择业的问题，并都经历了一个选择的过程。1912 年，19 岁的毛泽东在专业的选择上举棋不定，变换再三。他先报考了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商业学堂、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在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学习一个月后，他感到不满意，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在这里，毛泽东每日到省立图书馆读书，广泛涉猎 18、19 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包括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政治、哲学、逻辑，以及古希腊、罗马文学艺术方面的著作。

但毛泽东读得最多、最精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这里仅举一例：毛泽东青年时代就非常喜欢古文，直至晚年终生不断。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因为韩愈书的善本极贵，毛泽东买不起，于是在一家旧书店里买了一部廉价的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毛泽东把这套书买回来后，发现不但页面破损，文字也有讹误。于是，他到学校图书馆借来了一套善本，逐字逐字校勘，改正讹误。有一个时期，毛泽东每天早晨都诵读韩文。

对于毛泽东的这段生活，他的同窗好友周世钊曾写道：毛泽东读韩文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部意义，首先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了解、领会，使其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反复的默读和朗读，这样就懂得更深，记得更熟。通过这样持久的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背得很流利”。毛泽东后来买了一套二十多册的《韩昌黎全集》，还将国文教员袁仲谦批注过的韩愈文集善本借来校正其中的讹错。其学习笔记《讲堂录》后面便是读韩文的笔记，共包括七篇诗、赋、论，即《元和圣德诗》《改葬服议》《谏臣论》《省试学生代斋郎议》《感二鸟赋》《复志赋》《闵己赋》。每篇后面有许多条词、

句的释义。关于当时读韩文的情况，毛泽东后来在同斯诺谈话时曾专门说过，并谈到了韩文对他的影响：“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用字。所以，多亏袁大胡子（袁仲谦），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读韩文。

也许这些都不能不造成后来张闻天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问题认识上的差异。

就性格而言，毛泽东与张闻天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从小就不是一个俯首帖耳，百依百顺的孩子。他倔强、勇敢和“离经叛道”。他不仅敢于反抗父亲的守旧、苛刻、自私，还敢于反抗封建的族权势力。

1936年，毛泽东曾经与斯诺说：“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意见的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在我们家里，辩论的斗争在不断地发展着。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大约13岁的时候，有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下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毛泽东对父亲最大的“忤逆不孝”，大概要算抗婚了。14岁那年，父亲给他包办娶了18岁的媳妇罗氏，实际上是为家里添了一个劳力。但毛泽东始终不承认这桩婚事，从未与她同居。父亲也无可奈何，唯一能做的就是将“毛罗氏”作为毛泽东的原配写进毛氏家谱。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随着手头的钱攒多了，发财之心也就更大了，于1903年买进了堂弟毛菊生的七亩水田。毛菊生当时家境十分贫困，祖辈交给他的七亩祖业眼看就要保不住了。毛泽东和文七妹知道这件事后，联合起来坚决反对。尽管后来没能阻止毛顺生买田，但这件事给少年毛泽东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 1919年的毛泽东。

另一个鲜明反映出毛泽东性格的是“祠堂风波”。1910年端阳节前后，韶山出现了“吃大户”的风潮。饥饿难忍的人

们成群结队地拥进富豪人家，打开粮仓，倒出谷米煮饭吃。正是人们缺吃少穿的时候，毛氏族长毛鸿宾却把族上的一百多担积谷私下高价卖给米商。族人发现后，一个叫毛承文的带领几个穷弟兄要开仓分谷。可毛鸿宾依仗权势，把毛承文绑了起来，准备以“忤逆不孝”、“破坏族规”的罪名，企图将其毒打后沉潭毙命。毛泽东知道后，非常气愤。他和几个穷苦农民一起，迅速跑到祠堂厉声问道：“承文哥犯了什么法？为什么要打他？”毛鸿宾气势汹汹地说：“小家伙，你在学堂读书，谁叫你跑到这里来的。他违犯了族规，该当何罪，你晓得不？”毛泽东毫不示弱，据理力争：“我是毛氏子孙，难道进不了自己的祠堂？”毛泽东又接着说：“我已搞清楚了，违犯族规的不是毛承文，而是私自出卖族上积谷的你！”大家见毛泽东有这胆量与族长作对，也跟着闹起来：“叫毛鸿宾把积谷追回来！”“我们到彭家铺子吃饭去！”“我们也要吃大户去。”毛泽东的反抗行为，得到了满堂族人的支持。毛泽东从毛承文口里扯出毛巾，又亲自给他松了绑。这时，毛鸿宾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 1919年的张闻天。

1910年4月湖南粮荒，长沙饥民成群结队到湖南巡抚衙门示威，后遭到镇压。这就是长沙著名的“抢米事件”。这件事给少年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时期，他读到了一本关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开始意识到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职责。

与毛泽东一样，张闻天也经历过一场婚姻的抗争。所不同的是，张闻天的抗争以失败而告终。

1918年寒假，张闻天一回到家里，父母就把完婚的大事突然

提到了他的面前。他们已经把一切准备妥当，要他同邻村一个善良而不识字的卫姓女子完婚。聘礼已经送过去了，吉日已经择定，新房已经粉刷。他们觉得尽到了做父母的责任，希望看到儿子满意的、感激的笑容，但万万没有想到，得到的竟是激烈的反对。在受过民主思想熏陶的张闻天看来，这种包办婚姻是父母设置的牢笼，是剥夺他恋爱的自由权，是蔑视他个人的人格，是不承认他是一个有意志有情感的“人”。新思想与旧传统的冲突在儿子与母亲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吵。争到最后，张闻天决绝地说：“你要娶媳妇的话，就不要我这个儿子；你要我这个儿子的话，就不要娶媳妇。”母亲伤心地抹着眼泪，执拗地回答：“我两个都要！你是我养大的，你忍心不要我，不要你的娘吗？”^[1]

在这场新旧冲突中，母亲终于得胜。张闻天“家庭革命”的第一个回合没有成功。他只得勉强收下母亲给予的这个“馈赠”，而卫月莲这个普通的农家女子，也成了“新旧过渡时代的牺牲者”，婚后生了两个女儿。这次失败给张闻天极大的刺激。他感到个人力量的软弱，即使是

[1] 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14页。

母子的亲情也无法融化封建传统的冰块。他痛切地感到，不反抗旧社会的道德与习惯，从灵魂到肉体都没有自由可言。张闻天这种痛苦的、激愤的感情体验，在若干年后他的文学创作中多有宣泄。母亲硬是把违背儿子心愿的婚姻强加给儿子，其结果是将儿子推出了自己的怀抱。张闻天不久就离开家，投身新文化运动与社会革命，封建婚姻的压迫不能不是一个直接的动因。

通过毛泽东与张闻天对婚姻抗争的态度和结局，不难看出毛泽东与张闻天在性格上的差异。也许正是这种性格上的差异性，使得他们在日后中国革命的大潮之中，呈现不同的特质。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改变了中国的发展道路，也改变了毛泽东的发展道路。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湘乡省中学校长的许可，来到学校发表了一次慷慨激昂的讲话，号召大家行动起来拥护革命。毛泽东听了非常激动，决定同几位朋友去参加革命军，为完成革命尽力。当时，湖南起义胜利后，革命军立即招募新兵，准备派兵北上支援武昌，以与从南京南下的袁世凯反动军队对阵。这样毛泽东便于10月底在长沙报名参加了革命军，成了一名普通的士兵。

毛泽东当时只有18岁，但他对于出操上课等都非常认真，接受紧张的军事训练，在短短几个月内基本上掌握了军队中的训练课目。后来，当毛泽东提到这段经历时，他说：“辛亥革命的时候背过几天（步枪），什么立正、稍息、托四把枪还相当可以。不是吹牛，单个教练、排教练、连教练、营的野外演习也搞过。”当兵时，毛泽东把很有限的七元军饷，除了每月的伙食外，都用来买了报刊。特别是《湘江日报》，该报讨论社会主义，毛泽东正是从中第一次知道了“社会主义”这个名词。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从而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同年春天，正当湘军准备采取行动反对袁世凯的时候，孙中山与袁世凯达成了和议，南北实现了“统一”。就这样，毛泽东结束了为期半年的早期军旅生活。对于毛泽东而言，这半年的军旅经历对于他以后的军事领导工作，不无启发意义。

离开军队后的毛泽东，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此时的中国正处在

辛亥革命的社会变革时期和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中。中国向何处去？个人向何处去？这些都吸引着每一个有志青年去思索。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主要靠自学读了大量的书，其中有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穆勒的《群己权界论》，赫胥黎的《天演论》，卢梭的《民约论》，斯宾塞的《逻辑》等等。同时毛泽东还研究了俄、美、英、法及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等。这些新知识、新信息，极大地提高了青年毛泽东的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

1913年春天，20岁的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1914年春并入第一师范）。在师范学习期间，毛泽东在一批进步老师的影响下，认真研读了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等课程，尤其对军事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其学习笔记《讲堂录》中，就曾记载了老师在讲课中涉及的军事思想方面的内容。如：

“两军交绥，安者胜矣，骄则必败。”

“矛杀人，盾避敌，各当所用，此谓器使人。”

“夫兵者，国之卫也，非强悍有力者不胜其任，尤非多受教育者不能有功。吾国士人既甚弱矣，而兵出于招募，而无赖鲜识之徒充其选，驱之临战，不待交而先溃，历年国受巨创者以此。”

“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尚已。”

“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祖，抑庶几立言君子矣。”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

“苏洵论曰，按言以责行，孙武不能辞三失：久暴师而越衅乘，纵鞭墓而荆怒激，失秦交而包胥救。言兵则吴劣于孙，用兵则孙劣于吴，矧祖其余论故智者乎？”

“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天之道也。”

“荆川文武全才，弓马擅长。”

短短万余言的《讲堂录》，就记下了这么多的有关古代用兵作战方面的知识，而且涉及的人物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曹操、孙权、诸葛亮、孙武、吴起、管仲、商鞅、汉光武帝、张良等，另外还有外国的大军事家恺撒、拿破仑。可见，毛泽东这时对于军事问题的研究和涉猎已较深入和广泛了。

1918年6月，毛泽东结束了他在第一师范五年半的学习生活，和蔡和森、张昆弟等志同道合的朋友，暂寄居在湖南大学筹备处（即岳麓书院半学斋），一面读书，一面研究自己今后的计划。

同年8月中旬，毛泽东同萧子升、罗学瓚、罗章龙、陈赞东等二十多名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离开长沙来到北京。8月间，毛泽东作出湖南学生留法勤工俭学计划，同萧子升等驻京主持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工作。10月，毛泽东在北京经杨昌济介绍，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并经蔡元培同意，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新到报刊和阅览室读者姓名的登记工作，月薪八块银元。由于工作关系，毛泽东时常到李大钊处请教，看到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并参加李大钊组织的研讨各种新思想的学生活动。这期间，毛泽东曾与在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分别在北大文科大楼谈话，主要谈论学术和人生问题。

1919年7月14日，湖南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他在创刊宣言上极力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作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在创刊的宣言中，毛泽东以激烈的语言呼号：“时机到！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1]接着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第一版上，以《民众的大联合》为题，连续写了三篇文章，阐明了民众大联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大联合的方法，以及民众大联合必定成功的道理。并且预言，俄国革命以民众的大联合所收获的“社会改革的胜利，必将普及于世界”。

[1]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第294页。